

19.11.08

29

揭陽文史

揭
陽
文
史

第九集

第9

515500



揭阳县政协文史编辑部

1988.11

封面题字：刘昌潮

封面设计：陈少田

《揭阳文史》编辑部

主编：刘理之

顾问：郭笃士 郑衡

编辑：王钊 蔡楚云 林克

广东省出版物印刷许可证第326号

目 录

统 战 资 料

-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揭阳 陈息明 (1)

人 物 春 秋

民主、爱国、革命

- 记郑立仰同志 郑本光 林 克 (7)
归侨教育家许宜陶 陈训霖 (10)
怀念张仿周同志 (诗) 贝闻喜 (14)
揭阳清末进士曾习经 李 峤 (16)
古文学家姚秋园 郑 衡 (19)
旅港作曲家黄育义 彭妙艳 (27)

史 志 丛 林

- 民国时期揭阳重大事件记略 (续) 徐光华 (31)
谈明末清初揭阳兵事三十年 陈一秉 (39)
聚厚火砻与揭阳碾米业 郑祖述 (46)
揭阳古代都·图考略 郑智勇 (48)

舆 迹 小 考

- 梅云厚洋村彭延年落籍故址 吴道跃 (54)
谈揭阳潮汐 陈一秉 (57)
地都“掘玉岩”考 郑智勇 (65)
揭阳县最早的古桥——渔湖桥 黄光启 (69)

文艺见素

- 揭阳近现代诗话（上） 孙淑彦 (72)
王名元著《传记学》简介 品茶居主 (78)
张式宝与老怡梨春戏班 陈诗侯 (81)
潮剧领奏五虎将之一张林贤 杨培群 (84)
风俗掌故谈 林道崇 (87)

历史传说

- 郑沛霖指控陈署本 王云昌 (91)
林元凯和他领导的义盟军 沈丁之 (95)
抗元英雄陈吊眼 黄月哲 林 画 (99)
郑皮罗造反邹堂山 蔡汉铭 (101)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揭阳

陈 恩 明

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胜利之后，中共潮梅地区各级党组织逐步建立起来。中共揭阳特别支部于11月间创建。同一时间，当时主政东江的周恩来同志派共产党员方临川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揭阳改组国民党县党部；接着又派随军东征的国民党左派陈卓凡任揭阳县长。1925年冬开始，揭阳地区的国共两党开始进行第一次合作，一直到1927年春，是两党合作的兴旺时期，是中国革命“向于成功之年”^①。

揭阳地区，国共两党合作一开始就进入卓有成效的时期。

担任揭阳县长的陈卓凡是一个思想进步、拥护革命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经常与学友彭湃、杨闇屏一起研究社会问题，认识到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回国后，他参与海丰的农民运动，1925年随军东征，在周恩来领导下做政治工作。陈卓凡到揭阳上任后，站在国民党的左派立场，积极拥护孙中山制订的“三大”政策，坚决贯彻周恩来所制订的“实行民主政治”等政治大纲，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与共产党进行充分合作。在他上任的短短7个月中，揭阳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邪恶势力几乎抬不起头来，治政及各项建设颇有建树，在人

民群众中有较高的声誉。陈卓凡的革命态度，为揭阳地区国共两党的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改组后的揭阳国民党，左派力量占上风，他们宣布秉承孙中山的遗志，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召开的国民党揭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宣言宣布：对内“联合农工商学兵”、“扶植无产阶级”、“澄清吏治”、“铲除土豪劣绅讼棍及一切不良分子”；对外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实行世界革命，以解除世界弱小民族之痛苦”。^②为了加强两党的信任和合作，共产党员卢笃茂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于国民党揭阳县党部任职青年部长。在国民党揭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之一。在国民党县党部任职的还有青年团员江明冷、林新民，分别担任工农部长和商民部长。

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也有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任职。有如当时全县最大的革命群众组织揭阳县农民协会（筹委会），聘请了国民党左派人士陈祖虞、郑德初分别担任秘书长和顾问。两党精诚合作，互有参政。推动了国民革命事业的进展。

1926年2月，在汕头市召开了东江各属官吏及人民代表会议。揭阳国共两党一起出席参加，对行政事项；如交通、建设、商务、生产、治安、警察、农工、教育诸要政进行热烈的讨论。县长陈卓凡及揭阳县农会代表、共产党员颜汉章分别在大会上作铲鸦片烟经过的工作报告及揭阳县土劣阻止农民运动之事的发言。会议充分体现了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气氛。

揭阳国共两党还联合举行各项政治活动。如，1927年元旦，在韩祠广场举行纪念孙文总理就任总统职暨庆祝北伐胜利大会，由国共两党主办，参加会议的还有农、工、商、

学、妇女、政等几十团体，约万余人。中共揭阳县委宣传委员张秉刚作北伐胜利报告，国民党揭阳县长丘君博作政治报告。青年团书记江明冷代表各团体在会上发言。又，1927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3周年纪念日，国共两党除在县城召集各界筹备纪念外，国民党县党部还就开展纪念列宁逝世活动一事发函通告各区，希望各区党部“刻日就地召集各界筹备纪念，事关党务盛典，幸勿延误”。⑤

对正义事业，国共两党共同给予支持。1927年1月7日，揭阳真理中学举行罢课，并致函各社会团体，说明罢课原因：“敝校受帝国主义者之所支配压迫，故不得不罢课，希望贵团体实力援助，以达收回教育权之目的。”真理中学是帝国主义创办的教会学校，他们通过校董会的形式控制学校教育大权，可以随意开除不合他们心意的进步校长、进步教员。强行用“圣经”作为教科书，进行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腐蚀和毒害青年一代灵魂。学生们罢课的反帝爱国行动，很快得到揭阳一百多社会团体的支持，其中由共产党、国民党等发起的28团体立即组成“援助委员会”，并先后派出代表到真理学校慰问罢课学生。代表中有国民党县党部秘书黄绍舜、县党部青年部长卢笃茂、共产党员余德明、张秉刚等。县长丘君博还据情指令县教育局长赴真理学校关心罢课学生，制止校董会的不良行为。在党政、社会团体的有力声援下，迫使该校校董会与学生代表谈判，同意接受学生提出的一些条件。

由于揭阳地区两党的真诚合作，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因而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政绩，具体表现在：

（1）各革命群众组织相继建立。两党合作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相继建

立，全县最多时期有120多个革命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革命声势浩大，地方恶势力抬不起头来。

(2) 扶正压邪，革除弊政。陈卓凡在任期间，开展打击奸商、买办、贪污官吏的活动，对民愤较大的官吏及警察公务人员，开除一批，然后公开考试择优吸收一批。重视教育，创办学校，开除学阀，委任在教育界中有较高威信的人主政教育。

(3) 为民兴利，造福社会。

陈卓凡在职期间，拆毁城墙，开辟交通，扩大马路，使城市出现了生机。破除迷信，革除陋俗，如开展“掠老枢”，毁神像，下乡铲鸦片等活动，都有利于民生事业。

1926年春，陈卓凡到任不久，就要求刚组织起来的基层工农会承担起搬毁神像和“掠老枢”的任务。这一主张，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没有考虑到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群众的思想觉悟及接受程度。搞不好，反而会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或为地方恶势力所利用。揭阳地方党组织派人向他提出建议，要做群众宣传工作，等待时日，群众觉悟了，形成自觉的行动，方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陈卓凡接受了这一正确的意见。

又如，地方恶势力及右派人物对陈卓凡的革新精神引为忌恨，视为眼中钉。他们罗织了陈卓凡的“十大罪状”制造舆论，上省控告，开展“倒陈”活动。对此，揭阳共产党组织采取三项措施保护陈卓凡，(1) 派代表上省陈情，说明陈卓凡治揭功绩，反映当地群众留陈愿望；(2) 通过国民党左派陈祖虞等，在国民党组织内部揭露倒陈的反革命实质；(3) 发动工农清算罪恶昭著的土劣政客，搞臭孤立恶势力，以回击反动派的进攻。实施上述各项的结果，虽未能保

住陈卓凡，但也抑制了反动势力企图通过“倒陈”而打击革命团体的阴谋。陈卓凡离开揭阳时，反动派又要暗杀他。在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加上陈的机警，才脱离险境。

三、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

国民党是一个由左、中、右组成的执政党。对各派周恩来曾作了这样的分析：“左派是革命的，中间派有革命倾向性，而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

1926年揭阳地区工农运动兴起之后，国民党右派与地方恶势力互相勾结，明的或暗的加以阻挠。对陈卓凡的革新精神，支持革命运动，加以妒恨。他们抓住陈卓凡工作的某些过失，制造舆论，开展“倒陈”活动。1926年下半年，在“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各地国民党右派大肆分裂破坏各群众组织。揭阳地区的国民党右派，于8月间制造了国民党二区的赋吏无故逮捕农会会员的事件。12月制造了“张杨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右派头面人物唆使流氓打手强行绑架岭东工会委员长杨石魂，阴谋置于死地；挟持殴打左派商会执委张浦南。翌年3月，又制造了“洋稠岗事件”，挑起农村中的右派组织“新国民社”与农会的冲突，由磨擦发展至械斗。1927年随着国民党“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从4月15日起，揭阳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动手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揭阳地区的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至此宣布破裂。

注释：

① 见1926年3月《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纪略》

- ② 周恩来以“伍豪”的笔名发表的《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载于《向导》周报第三集第九十二期)
- ③ 周恩来:《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1926年12月10日)
- ④ 1927年1月19日《岭东民国日报》:《全县代表会开会情形》
- ⑤ 1927年1月15日《岭东民国日报》:《县党部通告纪念列宁》



民主·爱国·革命

——记郑立仰同志

郑本光 林 克

郑立仰同志是爱国归侨、革命民主人士。1909年出生于揭阳县榕城镇。青年时代毕业于揭阳榕江中学（即现在揭阳一中）。他从1930年至1948年，三度泰国，先后在曼谷任新潮学校、中华民校、树人学校教师，和思源学校校长。在泰期间还当过商店职员及受聘《晨钟日报》副刊编辑。他思想倾向进步，富有爱国心，虽身居异邦，仍关心祖国解放事业，为革命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1948年他携眷回国，仍以革命同路人身份，和中共地下党同志密切联系，接受革命教育，关心和支持革命事业。其时，他在榕城与人合资创办“荣泰行”商店，后来以商店掩护地下党同志的革命活动，并帮助地下党传送进步报刊。当时山上游击队物资紧缺，生活艰苦，他多次筹集麻袋等物资支援游击队。1949年解放前夕，他接受地下党的任务，经常搜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提供给党的领导，并对保管敌伪档案人员进行策反，稳定他们的情绪，保护好敌伪档案资料。县城解放时，他第一个燃放爆竹迎接解放军进城。

解放后，他与郑本光等同志受军管会委命接管旧商会。

后来，成立榕城市工商联时，他担任主任。1951年他调往汕头任“中国粮食公司潮汕分公司”副经理，翌年调至汕头市“五反”办公室当研究员。“五反”结束，调任汕头市教育局秘书科副科长。在汕期间，他忠于职守，做好本职工作，得到同志们的好评。1957年，因工作需要调回揭阳，先后被选为揭阳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第一届至第六届副主席、第五届省人大代表、广东省侨联委员、汕头市侨联会副主席，揭阳县侨联会主席等职。

任职期间，他长期分工侨务工作，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他积极贯彻党和国家的的侨务政策，维护华侨的权益，发动华侨支援家乡建设和各项公益事业。六十年代初期，县组织农业生产，急需解决化肥紧缺问题，他积极向侨胞宣传党的政策，热情做好接待工作，激发他们爱国爱乡热忱，自愿捐赠化肥进口，支援家乡农业生产，为夺取丰收做出贡献。他还对揭阳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贡献力量。十年浩劫期间，他虽身处逆境，仍坚信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文化革命”后，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服从工作需要，以古稀之年，再次出任侨联会主席。其间，他满怀信心，积极工作，为开拓侨务工作的新局面而操劳。他常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鞭策自己，除正常上班外，还经常利用假日或夜晚废寝忘餐地工作，被干部职工称为闲不住的人。在党的开放改革政策推动下，他利用各种渠道，广泛联络海外的旧友新交，热情接待回乡探亲、旅游的各界侨胞和港澳同胞，向他们宣传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动协助侨胞解决困难，促使他们心向祖国，热爱家乡，为家乡四化建设，兴办公益事业出力。由于他在侨务工作的成绩卓著，1982年光荣的先后出席

地、省、全国“台归、归侨、侨属、侨务工作者表彰大会”，荣获奖励。

郑立仰同志在政协工作期间，真诚拥护党的统战政策，广泛联系各界人士，积极参加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活动。对国家和地方应兴应革大事，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虽年迈体弱，仍坚持工作，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在政协办公，苦心筹划华侨中学的建设事宜。由于心脏病复发，于1985年3月11日逝世。他忠于革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的崇高精神，得到人们的景仰。



归侨教育家许宜陶

陈训霖

许宜陶1906年10月17日生于揭阳县潭角乡渡头村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在家乡小学和县城真理学校读书。中学时代到厦门集美学校求学。1929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行政系。毕业后即受聘到福建省立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假期回家时常为村内外的青年办补习班，为他们补习文化，讲国内外时事和政治常识。

1931年9月，许宜陶应聘到泰国曼谷黄魂学校任教务主任。黄魂学校是一间华侨学校，“黄魂”即为黄帝之魂的意思，校长张亦铮在这间学校实施的是国民党的一套“正统”教育。后来师生们反对学校当局迫害教师，闹起学潮。许宜陶、邱秉经等人决定独立创办“崇实学校”。这一行动，得到华侨界进步力量的支持赞助。原黄魂学校进步教师余天选、郭鹰等人相继离开“黄魂”转到“崇实”，黄声、马士纯、吴剑等进步教师也纷纷到“崇实”任教。许宜陶任该校校务委员会主席，总管全面工作。

崇实学校定名“崇实”，主张“崇尚实际”。它的办学宗旨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为培养爱国华侨新一代献身，扎实为华侨社会服务。崇实学校的教师在许宜陶、邱秉经、马士纯、黄声等人的带动下，脚踏实地工，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学校除供食宿外，每月只发五铢泰币作生

话费，师生们一起打赤脚建校舍，同桌吃饭，以苦为荣，以工作、学习为乐。教师们认真备课，注重时事政治教育，传授爱国主义思想，教导学生仇恨法西斯势力，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当时，学校在当地报纸上开辟了《崇实》、《蕉风》、《椰雨》等副刊，由黄声、马士纯、张占汉、邱秉经等人负责编辑，师生们都踊跃投稿。崇实学校开办一年，学生就达八、九百人，分为中学和小学两部，主要招生对象是中下层侨胞子女，对经济困难的给予低费或免费就读。崇实学校在泰国华侨中受到普遍的赞扬，许宜陶、邱秉经、黄声等老师在华侨社会中也享有盛誉。

1933年年底，许宜陶回到国内，经中学时的同学吴光汉介绍，应聘到普宁兴文中学任校长。当时校长有权聘请教师。许宜陶先后聘请了黄声任教务主任，邱秉经任训育主任，马士纯任舍务主任。余天选、洪藏、王琴、杨少任、庄晖、黄耀等人也陆续到兴文中学任教。他们把“崇实”的精神带到“兴文”，把“实事求是”的匾额挂在办公室里。学校认真抓教师队伍建设，抓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教学内容的改革，实施“做的教育”，使兴文中学很快就形成了勤奋好学、尊师爱生、团结合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良校风。1937年，兴文中学两届毕业班学生奉命到汕头市参加全省毕业会考，获得百分之百毕业的优异成绩，名列全区前茅。

在许宜陶的倡导下，当地对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总校设立了初中、高小部，周围十三个村分别设立了初小分校，分校又附设民众夜校，创造出一种：中学+小学+农民夜校的“三结合”体制，使埠塘地区出现了教育事业空前兴旺的局面，群众把办学校当成自己的事。

在兴办兴文中学的过程中，许宜陶校长充分发挥了一个组织者、教育家的才能。他做好校董会的统战工作，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自己带头苦干实干，为人师表。他总管全校工作，还负责英语课教学，有时还兼教数学、动物、植物等课程。开学之前，他就挑着破皮箱、旧被帐到学校；课余时，他光脚板、穿裤衩与农民一起劳动，带领学生开荒种菜。有一年闹水灾，他便带领师生挑土壤堤。有些村庄闹矛盾，群众就到学校请许校长出面调解。当时，该乡大地主陈益斋也承认：“从来没有见过像许宜陶这样受四乡六里普遍敬重的读书人。”

许宜陶领导兴文中学时，创办了《兴中月刊》，师生们都踊跃投稿。许校长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也写了一批教育论文，主要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过去和未来的兴文学校》、《效率的教育和教育的效率》、《从硬的人生谈到硬的教育》、《潮汕教育的路线》。在这些论著中，他强调教育的社会性、时代性，主张教育要为“社会上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的利益”服务；提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热爱祖国、改造社会的有用之材；注重实际，主张实施“做的教育”。他运用这些理论指导了兴文的教育实践，通过教育实践充实了教育理论。

在马士纯等人的领导下，兴文中学发展了党的组织，一大批进步师生在这里参加了共产党，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1938年，陈益斋发觉党在兴文中学开展革命活动，便藉口聘期已到要解聘有“嫌疑”的马士纯、邱秉经、洪藏、杨少任、余天选等革命教师。许宜陶据理力争，表示“一人也不准退聘”，当校董会坚持“解聘”时，许宜陶也愤然辞去校长职务。

1939年下学期，许宜陶到党领导下的抗日进步学校南侨中学任教，他虽然没有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实际上起着“顾问”的作用。1940年下学期，南侨中学被国民党教育厅下令解散。许宜陶应聘到惠来一中任英语教师，一学期后，因他当过南侨教师，学校不再聘用。1941年春，许宜陶再次只身出国，远渡重洋到印度尼西亚。

到了印尼坤甸，他应聘任侨办振强学校教务主任。后来参加了西婆罗洲抗日同盟，以山区为基地，动员群众抗日，向联军揭露日寇在西婆罗洲的罪行。日本投降后，许宜陶与当地侨胞组织了中华公会，出任文化部长，还担任华侨学校中华公学校长，负责组织出版《黎明日报》。因为要求言论自由，曾被荷兰殖民政府关入监狱，在当地华侨声援下才获释。不久，他应黄声、邱及之邀辗转到泰国，担任中华商会总干事。

1948年，在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许宜陶回国参加解放粤东的斗争。曾任广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处副处长。广州解放时，奉命参加接收国民党教育厅。以后一直在省教育厅任职，担任过省教育学会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全国教育学会理事、省侨联常委、顾问等职。

许宜陶1987年5月28日于广州病逝。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工作，致力于华侨教育和革命教育事业，在国内外受到尊敬，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归侨教育家。